

# 1949-1950 年北京輔仁大學控制權的爭奪——

## 以校務長芮歌尼爲中心的討論

袁小涓\*

### 一、前言

北京輔仁大學由本篤會美國聖文森總會院（St. Vincent Archabbey）<sup>1</sup>與本篤會美國加西尼聯合會（American Cassinese Congregation），結合中國籍知識分子英斂之與馬相伯於 1925 年成立，爲一所美國修會在中國創辦的高等學府，初期設爲大學預科，名曰「輔仁社」，1927 年經北洋政府准予試辦才正式更名。

聖文森總會院院史中曾提及教會賦予美國本篤會士在北京建校的動機：「在現代中國的特殊情況下，教會應全力以赴對於具有文化修養和高等教育階層人士，進一步宣揚基督信仰……如今建立一所高等學校或學院至爲重要」，「傳信部熱切渴望在中世紀時拯救拉丁文和希臘文免於毀滅的本篤會，於北京建立一所強調中國學問的高等教育機構，使得聖教在中國的廣大土地上更能穩健成長。」<sup>2</sup>其做法爲「保存中國文學、藝術和哲學，並加以基督化。」達成「在中國人心目中立下一個真正基督教文化的理想典範。」<sup>3</sup>

1929-1932 年間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嚴重衰退，本篤會無法負擔輔仁大學的開支，聖文森總會院院長艾佛烈·柯區（Dom Alfred Koch）致函梵蒂岡傳信部，報告大學的財務困難，至 1933 年總會院積欠債務高達 40 萬美元。<sup>4</sup>羅馬教

---

\*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兼任講師。

<sup>1</sup> 聖文森總會院爲玻尼費斯·威瑪（Boniface Wimmer）於 1846 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所創建，是美國境內各本篤會中最悠久的會院，亦即美國加西尼聯合會的母會，故該會被稱爲「總會院」。G. B. O'Toole,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kng",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kng, Bulletin* No. 1, 1926.09, p.17-22.

<sup>2</sup> 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16-17。

<sup>3</sup> Jerome Oetgen 著，張琰譯，《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 1923-1933》（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4。

<sup>4</sup> 根據當時北京輔仁大學財務長歐斯瓦·貝克（Oswald Baker）於 1933 年送交聖文森總會院的財務報告指出，在 1925 年 2 月 1 日-1933 年 6 月 1 日間，校務費用爲 150 萬美元，其中 60 萬美元來自美國人捐款、學校收入和教廷每年的補助（1925-1933 年間，教廷總補助僅近 20 萬美元。）其餘款項則來自聖文森和加西尼聯合會其他修院捐款、美國本篤會司泰萊（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OSB）院長借貸以及輔仁本篤會教師薪資退還款。見 Jerome Oetgen 著，張琰譯，《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 1923-1933》，頁 67、72-73。

廷希望輔仁大學應該繼續保留美國的傳統，經柯區院長的建議，希望由美國聖言會延續在中國的教育事業。聖言會考量到即將面臨的財務問題，乃向傳信部提出不接受北京輔仁大學的債務，另要求教會每年提供 25,000 美元的援助，均為傳信部同意。對於校務的必要開支，聖言會由募款支應，避免動用教友捐獻的福傳經費。同時，教廷應表明北京輔仁大學是宗座的事業，屬教廷的財產，聖言會僅擁有使用權，以獲取所有教會領導和虔信天主教的教友支持。1933 年 4 月 29 日，傳信部正式宣布北京輔仁大學改由美國聖言會接辦，由美國聖言會若瑟·穆爾菲 (Fr. Joseph Murphy, SVD) 擔任校務長，傳信部任命德國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 (Joseph Grendel, SVD) 為教會監督，陳垣續任校長。<sup>5</sup>原本篤會士負責教學和行政職務改由聖言會士擔任，其餘五十名中國教職員和六名歐洲教師繼續留任。

1936 年德國籍聖言會士雷冕 (Rudolf Rahmann, SVD) 任校務長，在日軍侵略期間，北京輔仁大學在聖言會的護衛下勉強經營，得以在局勢艱難的環境中免於遷校，成為留在北京繼續辦學的少數學校之一。1946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義日軸心國戰敗，聖言會憂心國民政府會視北京輔仁大學為德國資產加以沒收，改由美國籍聖言會士芮歌尼 (Harold W. Rigney, SVD)<sup>6</sup> 出任校務長一職，以穩定校務。

芮歌尼自 1946 年 8 月 4 日至 1950 年 9 月 30 日擔任校務長期間，正處於北京輔仁大學情勢轉變的時期，由於輔仁為教會所創辦，校務及財務等重要決策由修會外籍高層人士決定，凡校務中涉及中國政府及中國籍教員等事務則由校長負責。國民政府時期，在教會的援助下，北京輔仁大學成為中國境內重要的高等學府。1948 年底，華北情勢丕變，翌年 2 月 1 日，中共人民解放軍正式接收北京，教會學校被視為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北京輔仁大學更被視為是教會以金錢和文化控制中國人，嚴重侵犯中國的教育主權，於是自 1949 年起，對於校務的掌控展開積極爭奪，1950 年 9 月，聖言會決定中止提供北京輔仁大學補助金，同年 10 月 12 日正式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管。在此期間，芮歌尼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與校長陳垣等華籍教職員以及教育當局之間的複雜關係為本文探討的核心。

有關本文討論範圍的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極少，多以輔仁大學校史為研究重點，對此一時期校務情勢發展敘述不多，難以深入瞭解。截至目前為止，對此段歷史較為完整呈現的有柯博識所著之《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全書以教會觀點探討北京輔仁大學校史，其中有關聖言會結束經營的始末與外籍神職人員的介紹有詳細敘述，重要性在於首度使用羅馬聖言會總會的報告資料，內容為芮歌尼記載自 1946 年接掌校務長後，至 1951 年每月的校務狀況，

---

<sup>5</sup> 陳垣於 1929 年受命為北京輔仁大學校長。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共教育局接管後，續任校長職。1952 年 9 月被任命為北京師範大學（併入原輔仁大學大部份學系）校長。

<sup>6</sup> 美籍聖言會士，1930 年於芝加哥附近的台克尼 (Techny) 被祝聖為神父，1937 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古代脊椎生物學博士，以傳教士身份在非洲迦納 Achimota College 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聖言會駐迦納的美軍隨營神父，戰爭結束後，從非洲直接被派往中國，1946 年 6 月 24 日抵達北京，他在對於中國毫無任何認識及缺乏大學行政經驗下，接任北京輔仁大學校務長一職。見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頁 123-125。

呈報教會高層，成為本研究的重要史料。

其次是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 校史資料革命史部分》，全書以學生運動為主，有關爭奪學校控制權時期，有專章敘述，內容詳盡明列各組織成員名單，對於深入研究成員的背景關係，有相當大的助益。

此外，由美國加州中文學者圖書公司編輯之《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分四冊，十七類資料，共 355 篇，收錄報紙、演說稿、記錄等資料，其中以控訴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文章收錄最多，有助於研究此一時期中國天主教的發展狀況，缺點為大部份文章缺乏詳細刊載時間，造成查閱的困擾。

本文從雙方對於中國教育主權的認知角度切入，嘗試探討為何中國籍教職員工與學生在此時結合人民政府展開對抗聖言會，爭取學校的控制權？聖言會在這場權利爭奪中進行何種安排？竭力維持何種立場底線？最後又如何導致聖言會撤資，結束 25 年在華的辦學成果？在北京輔仁大學的案例中，教育主權的問題表現在雙方對於人事與資金的爭議上，聖言會的立場為既是學校經費的支助來源，自然應握有學校的主導權；人民政府堅持反宗教與反帝國主義的立場，中國籍教職員深感長期受到壓制，便容易與政府結合，一致排外，爭取管理校政的權利。於是，芮歌尼在處於排外與反教的不利情勢下，首先在人事方面做出讓步，以爭取與新政府合作的機會。

## 二、人事權的調整

早在 1948 年校內教員便出現爭取教育主權的行動，11 月 6 日，由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和講師組成教授協會，草擬組織章程同時選出代表。在芮歌尼的報告中提到，其中少數人不是共產黨員就是支持共產黨的教員，組成教授協會的目的在於協助共產黨人接管學校預做準備，當天校內的神父和修女努力阻止章程通過與確定代表，至 27 日由聖言會神職人員開會協調人選。<sup>7</sup>

1949 年 2 月 1 日，人民解放軍接管北京，根據劉乃和回憶，當日陳垣心情異常激動，與柴德賡與她三人從學校步行到西直門大街，站在馬路旁歡迎解放軍。<sup>8</sup> 日芮歌尼、陳垣與張重一拜訪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部部長張宗麟，張表示不接見外籍人士，僅與陳垣、張重一兩人晤談。張宗麟指示宗教自由僅限於教會建築之內，大學不得講授宗教，不得教授反人民或反共產黨的言論。芮歌尼對此感到憂心，認為首先必須讓一些管理校務的聖言會及聖神使女會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S.Sp.S.) 神職人員退出重要行政職務，改由中國人擔任，使他們肩負更多責任並學習管理知識以適應新局。其次是藉由趨同中國人的生活

<sup>7</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November 1948, pp. 8457-8460.

<sup>8</sup> 劉乃和，〈陳援庵老師的教學、治學及其他〉，《紀念陳垣校長誕生 110 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231。

方式或有相同的飲食習慣，更加融入中國文化。對於未來校務管理的作法上，芮歌尼向聖言會提出兩種解決方案：第一，與共產黨人制定暫時協議，此與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rchbishop Riberi）指示暫時不關閉學校，必須與共產黨人士制定臨時協議的想法一致；第二，不放棄現有的任何權利，與共產黨人抵抗到底。最後聖言會及教廷駐華公使均同意採取第一種方案，隔日召開聖言會院務會議，決定人事調整案。<sup>9</sup>

在人事調整案未公佈前，由十八位教員<sup>10</sup>共同發表聲明，向校務長及校長提出八點要求，首次將人事權爭議訴諸文字聲明。

- 一、今後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須符合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精神。
- 二、宗教與教育嚴格分開，學校內不能作宗教性的宣傳。
- 三、學校經費之管理及使用權必須交與中國人，今後財政必須完全公開。
- 四、學校行政權必須完全交與中國人。
- 五、將來新的行政機構及其人選決定，必須採取民主形式，不許由少數人擅自決定。
- 六、目前貧苦學生必須由學校設法維持其生活。
- 七、凡關涉同仁之待遇及福利事項必須由大家協議決定，我們保留最後決之權力。
- 八、在學校改造期中，校政不得停頓，以免影響同學的學業。<sup>11</sup>

在教員提出八點要求後不久便成立中國教員會，陳垣在會中發表成立宣言，提出三大原則：一、使輔仁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二、宗教與教育必須分開；三、輔仁的行政權完全交與中國人。<sup>12</sup>日後陳垣依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逐步實行上述輔仁未來的發展原則，與聖言會由合作步上對立的關係。

芮歌尼針對上述八項主張，公布〈輔仁大學人事調整備忘錄〉中文版，由芮歌尼、聖言會參議及聖神使女會參議共同簽署，主要內容為「輔仁大學仍為私立天主教大學，其經費由教會及聖言會資助。」

在人事異動方面：

聖言會司鐸，芮歌尼校務長，哲學博士，呈請辭副校長職。因訓育制度已廢除，聖言會孫振之司鐸，法學博士，不再執行其職務。聖神使女會盧院長亦不再執行女院訓育主任之職務，並呈請辭女院院長職。聖言會葛爾慈司鐸，哲學博士，呈請辭教務長職，聖言會徐思本司鐸亦呈請辭事務主任職。……聖言會及聖神使女會教職員得留用，與其他同仁一同執教，一同

<sup>9</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February, 1949, pp. 8531-8533.

<sup>10</sup> 此十八位教員為：（數學系）劉景芳教授、（歷史系）柴德賡教授、張鴻祥教授、趙光賢副教授、（中文系）余嘉錫教授、蕭璋教授、顧隨教授、啓功副教授、葛信益講師、劉汝霖講師、趙貞信講師、（物理系）齊振禕副教授、趙東征兼任助教、（生物系）王玠講師、（教育系）徐金淥教授、（經濟系）陸錫純講師、（西洋語言文學系）張恩裕副教授、（體育系）賈士儀講師。見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February, 1949, p. 8534.

<sup>11</sup> 〈致輔仁大學中國教員會書〉，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p. 8634.

<sup>12</sup> 劉乃和等著，《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535。

工作。彼等工作僅為盡義務性質，不領薪俸，但大學供給彼等宿舍及會院。其生活費則另由聖言會基金內撥給。

在教會代表人事方面：

聖言會芮歌尼司鐸仍為北平私立輔仁大學校務長（Rector），因係由教會所指派，並在大學及其附屬機關中代表聖言會。

聖神使女會盧修女代表聖神使女會。

天主教會及聖言會之代表與聖神使女會之代表在行政會議中，或其接代之新機構中，為有表決權之會員，以維持學校及其支援者兩方面之聯絡與合作。<sup>13</sup>

同時聲明「行政會議或其接代之新機構得管理學校所用之財產。財產權之轉移必須徵得教會當局之同意。」又「行政會議或其接代之新機構及其隸屬委員會可以檢查大學之一切紀錄及賬目。」

這是最大一次外籍人事調整案，聖言會及聖神使女會神職人員退出重要行政職務，保留校務長一職，將重點放在教會代表，以確保校務決策不致違背教會立場，同時使得聖言會仍握有校務的主導權，輔仁大學仍為一所天主教大學。

在芮歌尼公布人事調整備忘錄的隔日，學校立即召開行政會議，籌組臨時制定政策的校政會議，由中國人組成，成員包括校長、秘書長、兩位院長及四個團體代表（教授、行政職員、工友、學生），委員會功能僅限於擬定臨時政策草案，送交行政會議裁決，芮歌尼提出由華籍神父孫振之代表聖言會出席，遭校長與秘書長排拒，會議中呈現出排外與反天主教的氣氛。<sup>14</sup>在第一次臨時校政會議中，決議輔仁今後的教育方針，應符合新民主主義，努力團結合作。會中討論九項提案，其中第六項提案有關宗教課程問題，決議廢除「天主教教義研究」、「天主教教會史」、「教宗通諭」及「倫理學」四門課程。<sup>15</sup>在此情形下，芮歌尼送交陳垣一份聲明，除指責在校中宣講任何反對天主教教義之學說立場外，更對於臨時校政會議在未允許教會代表參加的情況下，又未能徵得聖言會方面意見，即決議校務，堅決表示反對。此份聲明未為校長及政府所接受。<sup>16</sup>此外，校方依據政府指示裁減資本主義課程，增加馬克思主義課程，新聘教師開設唯物辯證法課程，並邀請燕京大學的共產黨員進行批評宗教的演說。<sup>17</sup>在芮歌尼向黎培理的報告中明白指出，人

<sup>13</sup> 孫振之於 1948-1949 年任訓育課主任，1951 年任聖言會輔仁團體院長，同年入獄，1976 年去世。見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頁 303。

<sup>14</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February 1949, pp. 8537-8538.

<sup>15</sup> 臨時校政會議主席：陳垣；成員：徐侍峰、余嘉錫、趙光賢、張重一、劉景芳、王玠、陸錫純、鄭寶珊、季學祿、劉翰屏、朱乃鑫、李永安、馮文若、王書寶、李成森。見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 校史資料革命史部分》（北京：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1997 年 9 月），頁 115。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March, 1949, p. 8570.

<sup>16</sup> 1949 年 3 月 25 日校務長暨在校聖言會參議會聯名致陳垣函，見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March, 1949, p.8557.

<sup>17</sup> 人民政府對於大學的方針為：「抓緊思想上領導」，組織一批黨員和進步人士，有系統在各大學進行學術講演，其內容主要是唯物史觀、新民主主義，由各校校務委員會或學生會聘請演講，此種演講，在各大學都要進行，不僅文學院。見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北平各大學的方針給北平市委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青年運

民政府控制輔仁，1949年暑期教員和行政職員都必須接受思想教育，所有想要求職的畢業學生，都要參加在清華大學舉辦為期五至六週的思想教育，校工都必須上過至少三個月的思想教育課程。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逐漸使輔仁由一所天主教高等學府轉變為宣傳共產主義無神論的中心，這種轉變，成為聖言會是否繼續經營輔仁的最重要考量。

芮歌尼多次察覺在未被告知參與的情況下，人民政府教育主管與陳垣、張重一及教職員代表秘會，商討輔仁的校務規畫。<sup>18</sup>芮歌尼在每月的報告中不時表達出深感時局艱困，對於輔仁是否能繼續維持辦學理念與校務的掌控，只能因應變化做出調整，一切按照羅馬聖言會總會指示。

4月28日文化部副部長周揚針對輔仁發表三項指示：

- 一、兩個教會團體的代表理應為校務會議的成員，應與其他成員平等，享有投票權，但不享有額外特權（指校務長為教會代表，應取消學校職銜）。
- 二、唯物辯證法與馬克斯主義成為革命的基本原則，學校必須教授這兩門課程，在其他課程中禁止講授宗教，學校不准舉辦反宗教的宣傳活動，亦不得將宗教列為學分課程。
- 三、校政會議置於校長之下，由校長、秘書長、院長和一群改革進步或程度高的教授組成（這類教授經由校長和教育委員會主席討論後，由教育委員會主席委任）。講師和助教代表二名，學生代表二名，沒有行政職員代表，工友無法參與此會議，但得以組成工會，選有代表保障其福利。<sup>19</sup>

第一項指示明確削減芮歌尼的行政職權，取消校務長職務，僅准許他保留教會代表，使其喪失學校的決策能力；第二項指示是對於宗教傳播的緊縮，改授共產主義相關課程，使教會學校無法達成辦學宗旨；第三項指示則將校政管理完全改由教育委員會掌握，使聖言會僅具提供辦學資金的功能，完全無法控制學校，以逐漸達成收回教育主權的目標。

面對人事的重大轉變，芮歌尼會見周揚和張宗麟，表達與新政府合作的立場，同時聲明聖言會應具有掌握輔仁人事、財務、管理與發展的決策權。周、張二人的態度為只要私立大學遵照人民政府的教育原則辦理，就會允許經營，學校應將宗教與教育分開，唯物辯證法列為必修課程，任課教師必須為政府許可。會後芮歌尼建議聖言會繼續經營輔仁。<sup>20</sup>

新的校務委員會於6月19日正式成立，主席為陳垣，芮歌尼為聖言會代表，

---

動文件選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頁722-724。

<sup>18</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April, 1949, pp.8568, 8569,8656-8657.

<sup>19</sup> 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頁172，引自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Addenda to a Letter from Rigney to the Superior General, June 20, 1949.

<sup>20</sup> 芮歌尼提出繼續經營輔仁的三項理由：第一，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尚不明確；第二，在實行上，中國共產黨較蘇共溫和；第三，周揚指示可用客觀立場而非用宣傳方式教導唯物論。換言之，神父也可以教授士林哲學並且針對教友開設心靈方面的課程。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June, 1949, pp.8674-8675.

盧德思為聖神使女會代表，其餘委員皆為中國籍教員和學生組成，共 19 人，絕大多數是非天主教教友。<sup>21</sup>在第一次會議中，便不顧芮歌尼反對，廢除其校務長的職務，改任理學院院長一職。<sup>22</sup>芮歌尼的校務長職位被迫取消後，為對付新情勢，唯一辦法即是由聖言會指派組成一個校董會做為繼續給予輔仁補助的條件，這個校董會必須是具有人事任命權與制訂學校政策的權力，由此展開另一階段控制權的爭奪。

### 三、校董會的爭議

自從輔仁的天主教特質轉變後，來自海外的捐款也相對減少。芮歌尼於 6 月 15 日收到在美國為輔仁募款的泰肯神父（Fr. Ralph Thyken）電報說明美國教友對於中國的捐款不如以往，所以由過去每月匯寄一萬五千美元的捐款改為五千至一萬美元。<sup>23</sup>1949 年 7 月 30 日傍晚，芮歌尼收到 1949-1950 學年的補助經費，由一萬五千美元降至一萬美元，聖言會則不願支付唯物辯證法及無神論課程所需的花費。<sup>24</sup>神職人員對於學校開設這兩門課無法接受，認為在此情形之下，難以再支持輔仁，也贊成聖言會減少的補助金額。

1950 年情勢對於外籍神職人員更形不利，人民政府於年初時即開始對外籍神父加以監控，在中國的大部份外籍人士僅獲准居留一年，少數特殊人士則未獲居留權，甚至有些教會高層人士遭到無預警拘捕，芮歌尼亦在監視之列。<sup>25</sup>對於學校人事與課程的改變，外籍教員相當不滿，一些外籍系主任自行請辭，另有一些外籍教員被迫辭職或停開課程。<sup>26</sup>6 月 8 日在首屆舉行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通過〈高等教育暫行規程〉、〈管理私立高等學校暫行辦法〉、〈關於高等學校領導關係的決定〉及〈關於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定〉，規範高等學校的具體任務為「進行革命的政治及思想教育」，各系課程則「應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sup>27</sup>「全

<sup>21</sup> 校務委員會成員：主席：陳垣。委員：顧隨、杜任之、趙光賢、徐侍峰、張重一、歐陽湘、魏重慶、趙錫禹、余嘉錫、劉景芳、楊成章、張星焯。教會駐校代表：芮歌尼、盧德思。講師助教代表：趙東征、賈士儀。學生代表：縱瑞堂、金永齡。見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 校史資料革命史部分》，頁 117。

<sup>22</sup> 芮歌尼的報告中記載校務會議於 6 月 21 日首次召開，《陳垣年譜配圖長編》引自《世界日報》21 日文內容將校務會議成立及會中決議記載於 6 月 19 日。本文採以芮歌尼報告中的日期為準。

<sup>23</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June, 1949, p. 8675.

<sup>24</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July, 1949, p. 8805.

<sup>25</sup> 芮歌尼在其著 *Four Years in a Red Hell* 一書中生動描述遭到跟蹤的過程，他以間諜罪名於 1951 年 7 月 25 日被捕入獄。見 Harold W. Rigney, *Four Years in a Red Hell*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5-28.

<sup>26</sup> 數學系李嘉士神父 (Fr. Stephan Richarz)、哲學系柴熙神父 (Fr. Albert Czech) 辭職，安祺樂修女 (Sr. Angela)、梅貞吉修女 (Sr. Ingonda)、賀梅蘭修女 (Sr. Hermelanda)、蔡庭蘭修女 (Sr. Bernwardine) 被迫辭職。安祺樂修女則因受學生抵制，被迫停止任教。見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註 160，頁 166。

<sup>27</sup> 〈高等教育暫行規程〉《新輔仁》，第十四期，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

國私立高等學校，無論過去已經立案與否，均須重新申請立案。」換言之，輔仁若依據法規辦理，聖言會將僅剩下補助的功能，校政的主權完全喪失，天主教的辦校精神亦不復存在。芮歌尼瞭解情勢的嚴重，希望藉由教會補助的條件，爭取校董會的成立，以扭轉不利的態勢。

就補助款問題，陳垣指出「1949年，教育經費的問題上雖經多次交涉，仍由原來的22萬美元降至16萬美元。本年以來，芮歌尼又因學校開設政治課及其個人感情和態度的偏見，與校方之間的小摩擦不斷發生。」陳垣進一步提到「自6月初至7月中旬，曾就此問題向芮歌尼交涉十幾次，希望教會方面了解中國的新形勢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改變從前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的心理，大家合作，辦好輔仁。然而未有結果，而且芮歌尼的牢騷和不滿，每次均有發作。」<sup>28</sup>芮歌尼函告陳垣1950-1951學年的經費已經有著落，但是聖言會有四項條件，主要內容有二：一是新的校董會必須由教會選任；二是教會得經由教會代表對人事聘任有否決權。<sup>29</sup>在此期間發生五位反教會的教員續聘問題，使陳垣力阻校董會的成立，雙方關係惡化。

這五位教員分別是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楊榮春、社會學系教授魏重慶、數學系主任劉景芳、哲學系主任李世繁及生物學系講師王玠。<sup>30</sup>陳垣聲明只要校董會符合人民政府規定得以進行任命，對於上述五位教員的人事否決權則無法接受。至於新的校董會主張可以由教會和校長任命，呈送教育部同意。陳垣經呈請教育部後，以書面答覆芮歌尼，其一，新董事會由教會與校長選任，經教部核准，即可成立；其二，教會代表對人事聘任有否決權，是絕對不能答應的。<sup>31</sup>校務委員會在會議中決議「一、同意校長對教會代表交涉的報告，一致擁護校長對教會代表回信中的主張，並堅決執行；二、在校長領導下，全校團結一致，穩步前進，辦好輔仁。」<sup>32</sup>學生會也一致同意並擁護校長的主張，對芮歌尼的無理要求提出抗議。工會亦表達同樣支持校長的立場。

在面臨中國籍師生及校工一致支持校長的作法後，芮歌尼採取強硬的態度致函陳垣，信中關於人事聘任否決權一事，清楚要求陳垣當晚提出一個「滿意的回答」，如果沒有就要電報首長「報告他們，關於繼續津貼的條件拒絕。因此，我們不得以不得不在七月底停止繼續撥款。」<sup>33</sup>陳垣認為芮歌尼在信中的態度十分不客氣，要求在半天內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覆，是比袁的美頓書還要苛刻，陳垣當下立即回函，信中寫道：「至於你堅決要求不續聘五位教員當給津貼的條件，這仍然是

<sup>28</sup> 劉乃和等著，《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頁551-552。

<sup>29</sup> 《新輔仁》，第十三期，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日。

<sup>30</sup> 楊榮春曾任于斌總主教秘書，亦受其付洗，積極向學生宣傳無神論，扭曲天主教教義；魏重慶為一位無法實踐天主教精神的教友；劉景芳長期持反教會立場；李世繁為教友卻佯裝成無宗教信仰，曾協助學生驅逐柴熙神父。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頁167-168。

<sup>31</sup> 1950年7月28日芮歌尼致陳垣函，見劉乃和等著，《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頁553-554。

<sup>32</sup> 《新輔仁》，第十三期，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日。

<sup>33</sup> 劉乃和等著，《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頁555-556。

運用否決權，我不能答應這樣的要求。」並且警告芮歌尼「輔仁開辦二十五年，……任何人不能隨便說不辦就不辦……如果你堅持這條件，使教會不繼續津貼，那麼對於教會、對於學校、對於人民政府，一切後果，你是要負責任的。」<sup>34</sup>

芮歌尼於7月29日公布〈告本校同仁同學書〉嚴正聲明不惜以斷絕聖言會的補助為由，堅持反對五位教員的續聘，內容為：

- 一、輔仁大學為天主教會所主辦，其補助費來源一向仰給於海外熱心教育的天主教人士所捐助。
- 二、在過去一年中，由於本校有幾位同仁為海外熱心教育的天主教人士所不滿。致使補助費的來源日漸枯竭。
- 三、本年七月十四日本人以教會駐校代表的立場向陳校長先生所提出的四項條件中的第二項關於否決權的要求，其目的就在於為本校經費來源免除阻礙，嗣悉該項要求與教育部新近規定不合，當即自行撤回。
- 四、本人最後向陳校長先生所提出的那幾位同仁，經教會最高當局來電示意，如仍留校任職，即為目前斷絕下年度經費來源的原因，為此本人曾將此點向陳校長先生一再聲明，惜終遭拒絕。因此，自本年八月一日起教會對輔仁大學之補助費即告斷絕，此後校內所有開支應歸陳校長先生負責，教會無法再來補助。<sup>35</sup>

就在芮歌尼公布〈告本校同仁同學書〉的隔日，張宗麟在演說中提出嚴厲批評：「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辦的學校，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之一。它麻醉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永世不能翻身，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所辦的學校的本質。」「輔仁……在去年臨時校政會議時就規定學校內部的事校長有最後決定權，這是合理的。」<sup>36</sup>陳垣31日晚在學校大禮堂召開校務報告大會，詳細說明補助費交涉的過程，強調「我們學校這件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單純的本校範圍以內的事件，更不是某個人和某個人的衝突；也不應當看成是教會和非教會的鬥爭；也不是中國“人”的鬥爭。這乃是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至於五位教員，周恩來表示應當予以留任，如果將來他們攻擊教會便應該解聘。<sup>37</sup>

對於教會大學的經費問題，早在1949年7月24日周恩來蒞校演說就指出像輔仁等私立大學，只要由中國人管理並依據人民政府的原則領導，就可以繼續存在，假使外國贊助者威脅取消財務支持，政府無論多麼困難都會接收這類大學。<sup>38</sup>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對於新民主主義的民族政策問題，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必須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精神。周恩來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提出「教會學校在與外國斷絕關係後，經費上有很大困難，政府也應該照顧。」<sup>39</sup>顯示人民

<sup>34</sup> 1950年7月28日陳垣致芮歌尼函，見《新輔仁》，第十三期，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日。

<sup>35</sup> 《新輔仁》，第十三期，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日。

<sup>36</sup> 《新輔仁》，第十三期，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日。

<sup>37</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August, 1950, p.9406 .

<sup>38</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July, 1949, pp. 8803-8804.

<sup>39</sup> 〈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

政府有意在教會撤資後全面接管。

輔仁開始為準備新學年的開支，向教育部借墊經費，發放教職員工的薪資，每月發放小米十四萬三千斤，維持輔仁的運作。<sup>40</sup>陳垣致函芮歌尼，詢問教會自 8 月 1 日起停止撥款是否表示教會從此不再辦理輔仁大學，希望芮歌尼正式答覆。兩日後，芮歌尼覆信表示至於經費一節，說明已致電報給教會當局，請求從長計議。相信在一切校務重新納入正軌之後，是不會再有什麼重大問題的。」陳垣再次去函芮歌尼，質問「一、來信沒有提到不續聘五位教員的話，是否已經撤消了這項要求？二、來信有校務重新納入正軌的話，是否就指遵照政府新頒的法令辦理，抑或別有所指？」<sup>41</sup>芮歌尼答覆：「不論學校經費與教員聘任，當都可再無問題。」芮歌尼表面回答陳垣的詢問，私底下分別於致函周恩來，建議由一些官方和知名人士擔任校董會董事，並且請求周總理提供適當人選。<sup>42</sup>周恩來針對問題作出指示，由教育部長馬敘倫以書面併同談話的形式轉達，張宗麟在場，會談主要傳達五項原則：一、校董會可在依法規下成立，教會不得干涉學校行政；二、不得將不信教與批評宗教視為是反宗教的行動；三、在中國境內的學校必須設革命的政治課；四、校長陳垣稱職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政策，不應變更其職位；五、五名教員的聘任，屬學校行政權限，教會不應干涉。<sup>43</sup>由上述可以看出，校董會依法成立後將置於行政組織之下，聖言會若繼續在中國辦學，則必須接受反宗教的行為和言論，神職人員也將被迫學習政治思想與無神論。這種情形嚴重威脅聖言會的核心思想，於是在 9 月 26 日羅馬聖言會總會長致電芮歌尼，決定停止補助。30 日教育部要求芮歌尼書面答覆，芮歌尼立即回覆，正式聲明教會中止繼營輔仁大學。10 月 12 日，北京輔仁大學正式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馬敘倫指出：「從現在起，輔仁大學是由人民政府管轄下的一所教育機構，是人民的輔仁大學。」張宗麟亦宣稱：「我們很高興接受人民政府所賦予的光榮任務。我們將會認真經營，並且有信心成功地完成目標。」<sup>44</sup>

隔日陳垣被任命為校長，同日出席輔仁大學接辦小組會議，討論有關於財產、課程、人事、經費及接辦辦法五大項。《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立即發表通訊，介紹與評論人民政府接辦輔仁大學一事；香港《大公報》發表〈賀輔仁大學新生〉；《文匯報》亦派員專訪陳垣校長。陳垣在《新觀察》發表〈輔仁大學反帝鬥爭的

---

出版社，1984 年），頁 15-20。

<sup>40</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Letter to Rome of August 2, 1950.

<sup>41</sup> 《新輔仁》，第十五期，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

<sup>42</sup> 官方建議的名單為符定一（毛澤東的老師，文化事務委員會委員）、Mr. Chang Shi-chao（周恩來的老師，前教育部長、文化事務委員會委員）、張東蓀（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文化事務委員會委員）、潘光旦（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兼主任），以上四位非神職人員，芮歌尼另延請四位聖言會神職人員，即李君武（Very Rev. Paul Francis Ly，北京教區代理主教）、孫振之、葛爾慈（Fr. Joseph Goertz）及徐思本（Fr. Peter Huengsborg）。見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註 205，頁 195。

<sup>43</sup> 1950 年 9 月 25 日，〈與輔仁大學教會駐校代表芮克尼書面談話〉，見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September, 1950, pp.9536-9537.

<sup>44</sup> 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頁 201-202。

經過——是爭教育主權，不關宗教信仰）一文中指出，「這次爭教育主權，不論是教徒非教徒都站在且一條戰線上……我們並不是反對宗教，我們擁護共同綱領，尊重信仰自由，大家認清了這一點，就團結得更緊密了。」<sup>45</sup>

聖言會結束 25 年在輔仁大學的經營，陳垣允諾聖言會神職人員仍得以繼續居住原處與任教，北京教區代理主教李君武亦建議繼續留任。芮歌尼於 11 月致函教廷駐南京公使時提到聖言會士和聖神使女會修女，仍留守輔仁的工作崗位照顧天主教學生和從事維護教會利益的工作，做了和以前一樣多的事。<sup>46</sup>其間除部分神職人員離開中國外，其餘均在 1951 年 7 月被捕入獄，經多次審訊後，於隔年 8 月驅離中國。輔仁大學則於 1952 年依教育部關於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決定，進行合併，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正式合併。輔仁大學中文、史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教育、心理 8 個學系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哲學和西洋語言文學系與北京大學合併；經濟學系（含貿易專修科、保險專修科）、社會學系勞動組和北京大學、清華和燕京大學的經濟學系合為中央財經學院；社會學系內務組與北京法政學院合併；教育部任命陳垣為北京師範大學校長。<sup>47</sup>

#### 四、結 論

回顧這段歷史，北京輔仁大學成為當時中國境內所有教會學校共同遭遇的縮影。由耶穌會在華創辦的津沽大學也面臨到與輔仁大學類似的人事與經費問題，難以延續。<sup>48</sup>燕京大學在司徒雷登創辦之初，即採取中國籍教員治校，不若輔仁大學出現嚴重的教育主權之爭，但是在 1951 年起，人民政府開始有計畫進行全國院系調整，針對教會各大學，如輔仁、燕京、津沽、震旦、金陵、聖約翰、之江、滬江等大學整併後撤消，斷絕西方教會在中國的教育計畫。<sup>49</sup>

抗日戰爭期間輔仁大學無論國籍，全體師生一致抗日，以求在淪陷區繼續辦學，不致中斷或西遷，卻在國共政權易幟之時，內部發生嚴重衝突，在短短兩年之間，便瓦解聖言會在中國經營二十餘年的努力成果，究其內在原因可從三方面探討：

一、反帝國主義思潮的盛行。反帝國主義思想與國家主義互為結合，從這個觀點來看，輔仁大學自始就是帝國主義勢力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透過金錢與教育的方法，達成其傳播宗教的目的。在日軍侵華，佔領北平期間，輔仁大學表現出一種抗日愛國的情操，成為華北地區少數持續辦學的高等學府，國共內戰期間，

<sup>45</sup> 劉乃和等著，《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頁 565-567。

<sup>46</sup>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October, 1950. pp.9615-9616.

<sup>47</sup> 林智源，《〈校史〉第七章 大事紀》，《輔仁校友通訊 25》（北京：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2003），頁 47。

<sup>48</sup> 芮歌尼特別提及津沽大學的情形。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December, 1949. pp. 8946-8948.

<sup>49</sup> 汪學文，《中共教育評析》（台北：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民國 76 年，頁 145-147。

輔仁大學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受到國民政府肯定。自從人民政府成立後，提倡反帝愛國主義，中國人民族情緒高漲，對於侵犯主權的行為，自然無法容忍，視聖言會為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人民，侵犯主權的對象，教會則代表一種壓迫的勢力。趙光賢認為「天主教人士……不能說他們都是帝國主義分子，但是他們確是受帝國主義文化與宗教侵略的毒害而不自知。」他認為當時中國境內的天主教中有兩種背道而馳的力量與趨勢，一種是長久在外國神父壓迫之下的教友，一旦覺悟，極力要脫離外國人的鎖鍊，用自己的力量來傳教；一種是尚未覺悟的教友們，還受著外國教士們的動聽的言詞迷惑，企圖與前一種新生的力量來對抗。<sup>50</sup>如此一來，反教會、反宗教的氣氛自然蔓延開來，成為無法遏止的風潮。

二、教育理念的歧異。如前言所述，天主教會在北京創辦輔仁大學的動機即在於對具有文化修養和高等教育階層人士，藉由提供西方科學知識的管道，宣揚基督信仰，安排課程介紹有關天主教的基本教義與倫理，禁止講述任何違背天主教教義的言論，除此之外，並不干涉其他人的信仰。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推行新民主主義教育，強迫各大學開設唯物論與無神論等相關課程，並加強對教職員工生的政治思想訓練，使得雙方在教學理念與內容上迥異，進而產生意識型態的衝突。

三、語言文化的隔閡。儘管國民政府於 1929 年即實施收回教育權的命令，輔仁大學依法設有董事會，延聘陳垣擔任校長，監督學校行政、人事安排與經費運用，實際上卻是由聖言會透過校務長直接掌握對學校的控制權，尤其是經費的支配，導致學校的重大決策皆是由聖言會決定，校長不具實質上的權力，陳垣曾自嘲為一個「不管事的甩手校長」。長期以來，這群外籍神職人員把持校政，致使中國籍教職員無法學習或參與校務的管理工作，於是爭取教育自主權成為中國籍師生的共識。相對於中國籍教職員缺乏實權，握有決策的外籍神職人員自成一體，難以融入中國人的團體中，這群學有專精的神職人員，有許多人年紀輕並且從未具有在大學服務的經驗，僅憑著一股教育與傳教熱忱來到輔仁，負起校務的管理重責。誠如柯博識提到聖言會接管輔仁大學初期：

除了一兩位漢學家外，沒有一位學者會說中文，但是都突然地在輔仁大學中佔有重要職位。例如神學家穆爾菲在 38 歲時來校服務，人類學家雷冕於 33 歲時來校，生物學家芮歌尼在 46 歲時來校，他們都是受到校務長的任命，自己毫無準備，在他們之中，沒有人具有豐富的學校行政經驗，沒有人瞭解中國的語言或文化。<sup>51</sup>

其中許多人到後來仍不願意學習中文，造成彼此間的隔閡，滋生不滿的情緒。芮歌尼察覺出情勢的不利，乃主動提出人事調整的建議，並且改以學習中文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融入中國文化，以平息不滿的情緒，但是已經錯失機會，成果

<sup>50</sup> 趙光賢，〈歧路上的天主教〉，刊於 3 月 17 日（未註明年代）《光明日報》，見中文學者圖書公司編輯，《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二冊（美國·加州，1995 年），頁 225。

<sup>51</sup> 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頁 80-81。

不彰。

儘管教會結束在中國的教育事業，仍對於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建立文化交流的互動模式具有重要的貢獻，其作法為建立嚴密的學校行政管理體系、提昇科學研究水準、嚴選教學師資，加強教學設備以提昇教學品質等方面。在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上，王曉朝認為「教會大學作為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曾經對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對新式教育制度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催化、促進作用。」<sup>52</sup>在文化交流方面，章開沅認為許多長期在中國教大學工作的西方教職員（包括傳教士），不可避免受到中國文化的熏染，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國文化，對有些西方人來說，教會大學又是一個觀察、瞭解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窗口。<sup>53</sup>無論是創校初期的本篤會或是接管的聖言會，在中國境內為高等教育均奉獻出相當大的心力，這群來華的傳教士無疑是文化交流的代表，達成「保存中文學、藝術和哲學、並加以基督化」的使命。

---

<sup>52</sup> 王曉朝，〈中國教會大學的教育理念及其借鑒意義——兼論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研價模式〉，《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頁 85。

<sup>53</sup> 引自章開沅，〈序〉，《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1991年）。見王曉朝，〈中國教會大學的教育理念及其借鑒意義——兼論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研價模式〉，《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頁 87。

## 徵引書目

### 一、英文書目

1. G. B. O'Toole,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kng",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kng*, Bulletin No. 1, 1926.09.
2. Rigney, Harold W. *Four Years in a Red Hell*.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3. Rigney, Harold W. *Rigney's Report*.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1948-1950.

### 二、中文書目

1. Jerome Oetgen 著，張琰譯，《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 1923-1933》（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
2. 中文學者圖書公司編輯，《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美國·加州：中文學者圖書公司，1995。
3. 王曉朝，〈中國教會大學的教育理念及其借鑒意義——兼論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研價模式〉，《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
4.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輔仁校友通訊》，北京：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2003。
5. 汪學文，《中共教育評析》（台北：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民國 76 年。
6.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 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 理念、歷程、教員》，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7。
8. 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 校史資料革命史部分》，北京：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1997。
9. 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
10. 劉乃和等著，《紀念陳垣校長誕生 110 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11. 劉乃和等著，《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

### 三、期刊

1. 《新輔仁》，第十三期，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日。
2. 《新輔仁》，第十四期，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
3. 《新輔仁》，第十五期，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